订制:资本时代的东亚画像
——16、17 世纪尼德兰制图学派中的中国与亚洲

宋 念 申

(清华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 北京 100084)

摘　要: 16 世纪后半期到 17 世纪,伴随着大航海及全球贸易的拓展,欧洲迎来了现代地图学的黄金时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出自以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为活动中心的尼德兰制图学派。在此期间,欧洲制图学家不但出版了第一幅以“中国”命名的地图,也不断扩充对亚洲、尤其是东亚的地图学表现。但地图学的发展、地图书籍的流行,并不仅仅是地理知识积累的产物。在全球资本主义网络形成的年代,地图既是工具更是商品。尼德兰制图学派的兴盛,与印刷业在低地国家的繁荣、书籍市场的勃兴、制图学家的职业化,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贸易活动息息相关。欧洲社会对亚洲空间的新的权力关系想象,亦由此展开。从地图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角度,可探究这一时期欧洲地图学发展以及欧洲对东亚的地理认知。

关键词: 地图学;东亚;尼德兰制图学派;寰宇大观;地图集

中图分类号:K 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2)02-0086-13

尼德兰制图学派,于 16 世纪下半叶兴起,在 17 世纪达到顶峰,是欧洲地图学发展史中承续古典、开启现代的重要一环。这一时期欧洲制图学家对东亚的呈现,既有《马可·波罗游记》的遗存,也有“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帝国对东方地理知识的渐进积累。更为重要的是,在市场竞争的刺激下,地图不再是人工绘制的、主要由国家或王公密藏的情报,而是成为可以批量印制、面向城市中产阶层的商品。尼德兰地区地图的生产、制作、销售和消费,正是欧洲现代资本主义各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印刷技术的传播、书籍市场的形成、低地国家市民阶层的兴起、出版行业的职业化,以及最重要的——以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欧洲资本对亚洲的拓殖。

以尼德兰制图学派的亚洲形象为例,本文考察资本主义如何推动了地图学的现代演进,地图又是如何表达着资本世界的地理想象。在分析方法上,本文不但将地图作为原始史料,阅读其内容,更视地图为一种具体历史环境下的产品。以产品视角来看,尼德兰制图学派地图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它们是资本时代商业订制的产物。资本主义不断重组、重塑着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空间,即列斐伏尔所谓“空间的生产”①。而商业订制的地图,就是此种“空间生产”最生动的视觉体现。订制地图一方面宣示着(商业)利益、(政治)权力和(知识)权威,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空间观念,这种观念强调扩张与产业,由个人主观排他性的边界所框定。因此这些地图反映并强化了当时荷兰所流行的法律和道德理念”。②在此背景下,尽管在当时的制图学中心——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几家著名的制图商竞争激烈,但和一般理解相反:这种竞争并不总是带来地理和空间观念的更新和改进,有时反而需要迎合大众既有的世界想象。地图的商品属性,构成早期全球化时代,欧洲新兴阶层审美和消费品位的一

收稿日期:2021-06-20

作者简介:宋念申,男,北京市人,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

①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1992.

② Elizabeth A Sutton, *Capitalism and Cartography in the Dutch Golden Ag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p. 46.

道风景,也是商业帝国的一种权力表达。

一、Chinae:欧洲首幅“中国”地图

1584 年,在安特卫普出版的最新版本的地图集《寰宇大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中,制图家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1527—1598)增加了一幅名为“Chinae”的地图。Chinae 这个拼写不同于一般拉丁文中“中国”一词(Sinae),也和前几版《寰宇大观》中亚洲总图里出现的“China”不一致,但指的就是当时欧洲人所认知的中国。这是欧洲第一幅以“中国”为名的单幅地图,图的背面还有一篇中国简述。那一年,是明朝万历十二年(图一)。

单是把“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理认知单元、列入图册本身,就是个不同寻常的举动。这当然不是说,欧洲人对中国的兴趣从此时刚刚开始——将近三百年前的热那亚人马可·波罗早就勾起了探险家们对中国的无限向往。但以往地图中,中国最多只是在“亚洲地图”或者“鞑靼地图”中占据一隅,而地图买家越来越不满足于此。奥特柳斯的这幅中国图,让欧洲人第一次可以凝视这个遥远的国度。它也成为此后几十年间欧洲人对中国形状的标准认知。

今天的人乍看此图(图一),会觉得相当陌生:首先,和我们熟悉的以北为上的图很不一样,它是以西为上的。这在《寰宇大观》中倒并不少见,比如英伦地图,就也是以西为上。其次,中国的海岸线是一条相对平滑的曲线,没有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构成的凸起,而西方和北方则被长长的山脉围住,使中国看上去是个椭圆形,像个竖琴。① 此外,地图下方画出了日本,却完全见不到中日之间的朝鲜。

图一　奥特柳斯《中国图》,1584 年版《寰宇大观》。来源:网络资料。

图二　奥特柳斯《中国图》局部,可见圆形湖泊中一个孩子骑木祷告,上方有拉丁文注释。

不过,作者已经尽力让这幅地图反映最新的中国消息。在西部山脉的上方,有一段拉丁文注释:

> 位于山西(Sancii)省的这个圆形湖,是由 1557 年一次洪水造成的。在这场洪水中,共有七座城市以及若干村镇被淹没,大量人口死亡。只有一个男孩,因为一根树干获救。

图中央标记为 Sancii 的地方,果然画有一个圆形湖泊(图二)。仔细看,湖中还有一个小人,坐在一根木头上,双手举起,像是在向上天祷告。为什么这件事情格外重要呢? 这段描述,应该指的是 1556 年的嘉靖大地震。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为惨烈的震灾,震中在陕西华县,达到里氏 8 级以上,波及周围数省,当地水系严重破坏。史载“或地裂泉涌,中有鱼物,或城郭房屋陷入池中……河渭大泛,华并钟南

① 关于竖琴的比喻,见卜正民:《全图: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地图学互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20 年版,第 191 页。

山鸣,河清数日。压死官吏军民,奏报有名者八十三万有奇”。① 可见,地图不但是地理信息的收集记录,也有传递历史信息的功能。在这一点上,欧洲和东亚的地图学传统高度一致。也正是这小段话,提示关于这幅地图更多的背景信息。

奥特柳斯并不是这幅地图的原始作者。他注明此副地图来源于 Ludovicus Georgius,这个拉丁文名字,一般被认为是指葡萄牙制图师、巴布达的路易兹·豪尔赫(Luiz Jorge de Barbuda,1564? —1613?)。关于路易兹·豪尔赫的生平,留下的资料不多,只知道他曾担任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海图与世界地图制作师”。也有学者认为他曾经到过中国。不过,关于这点还需要更多考证。② 他制作的中国地图及文字简述,主要取材于西班牙教士、地理学者伯拉迪诺·德·埃斯卡兰特(Bernardino de Escalante)1577 年出版的《东方航海志》③。本书是 16 世纪以西班牙语出版的第一部关于中国的专著,影响广泛,也是胡安·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中华大帝国史》的参考之一④。但埃斯卡兰特恐怕没有到过中国,他的信源,除了有到过西班牙的中国人的讲述外,主要是葡萄牙人的著述,包括历史学家巴罗士(Joao de Barros)的《亚洲旬年史》(Decadas da Asia)第三版,以及道明会传教士克路士(Gaspar da Cruz)的《中国志》(Tratado das cousas da China)。⑤ 巴罗士也未到过亚洲,和埃斯卡兰特差不多,他的中国描述,很大程度上依赖其中国奴隶翻译的资料⑥。而克路士则是这些写作者中唯一到过中国的,而且正好在 1556 年到 1557 年短暂停留广州。他从一位富商那里打听过大地震和洪水的事情。在《中国志》的第二十九章,“一五五六年中国人受到上帝惩罚”里,他列出了 7 个受灾的“城市”和一些“地方”,以及某地“只有一位小男孩获救”的传闻。⑦如果这段文字,就是奥特柳斯地图上“七城市”和“洪水男孩”的来源,那么这个故事在二十多年里,由文字衍生出图像,可能也是通过葡萄牙、西班牙,传到尼德兰,经过了多重转译和演绎。

《寰宇大观》中的中国地图(图一),创下了欧洲地图学史上的几项第一:第一次画出了中国的长城;还在长城以外第一次画上了让欧洲人惊叹的风帆车;第一次给菲律宾的岛屿命名——虽然只有棉兰老(Mindanao)和宿务(Cebu)。沿海的省份(从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到山东)也都基本可以和现实对应。尽管如此,图上对于中国的展现,其实并没有超越《马可·波罗游记》太多。比如长城之外罗列了一长串的地名,配以排列整齐的城堡标志,显示作者并不清楚这些地名的相对位置和关系,只好一股脑堆上。北方山脉之外,点缀着几个蒙古包及帐篷状的城池,这些也都来自于马可·波罗。

此时欧洲的地理学者,尚未搞清“中国”和“契丹”(Cataio 或者 Cathy)的关系。在《寰宇大观》的亚洲总图(题为《亚洲新描述》,图三)中,China 只居于南方的广东附近,而 Cataio 与 China 并列,居于北方。

---

① 《明世宗实录》卷四三〇,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壬寅。

② 曼斯缪·奎尼、米歇尔·卡斯特威诺:《天朝大国的景象:西方地图中的中国》,安金辉、苏卫国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8、150 页。但该书并未注明他来过中国的资料来源。

③ 原书标题为 *Discurso de la navegacion que los Portugueses hacen a los Reinos y Provincias de Oriente, y de la noticia que se tiene de las grandezas del Reino de la China* (“葡萄牙人去东方王国及省份的航海日志以及关于中华王国之伟大的既有知识”)。

④ 尽管门多萨在书中并未提及,但美国史家唐纳德·拉赫认为其第一部分很多地方依赖埃斯卡兰特。Donald F,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ume I, Book Tw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747.

⑤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p. 742.

⑥ 龚缨晏、胡刚:《16 世纪发生在西班牙的一场“印第安斯人”诉讼案》,《世界历史》2017 年第 5 期,第 93—104 页。

⑦ 克路士的《中国志》出版后影响并不算大,后来其英译本收录于博克舍(C.R. Boxer)编辑的《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见 C.R. Boxer,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1550—1575), London: Routledge, 1953, pp. 224-226。亦可参考该书中译本,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158—159 页。中译未表达出小孩为男孩之意。书中所列“城市”(city)和“地方”(region),可能包括渭南、咸阳、蒲州和太原府,其余则未考证出来。

显然,这是将 China 等同于马可 · 波罗提到的 Mangi(“蛮子”)。此外,该图的中国海岸线也延续了早先托勒密《地理学》中粗糙的斜线。另一处体现认知顽固性的地方,是《中国图》上方的标示的“清迈湖”(Chiama lacus)。这个被想象成东南亚多条大河发源地的湖泊,也由葡萄牙史家巴罗士在《亚洲旬年史》中最早记录。它在欧洲人的地图上顽强存在了 200 年,直到 18 世纪才被确认为虚构①。与此观念类似,中国境内也画着几处大湖泊,枝杈四散的大河流皆交汇于此。

图三:奥特柳斯《亚洲新描述》,1570 年版《寰宇大观》。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网站。

也就是说,在这幅以中国命名的地图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在最近二十多年里葡萄牙人获取的信息(嘉靖大地震),也能够看到马可 · 波罗近三百年前带来的信息,还掺杂一些虚构和想象。不同的时间,被叠加在了同一张地理图画里。可是,葡萄牙人的商船早在 1513 年就已经巡弋于中国沿海,并不断带回关于东亚海洋和陆地的新地理知识,为什么制图师还是要坚持马可 · 波罗时代的认知,并一直延续到 17 世纪早期呢?

不少学者已经指出,阅读地图、特别是古代地图,并不只有科学性这一个视角。② 地图中展现的政治诉求和文化思维,也都极为重要。我们并不知道路易兹 · 豪尔赫的原图究竟是什么样的。哥伦布之后,西班牙、葡萄牙展开地缘竞争,大航海所产生的新地图,多被君主视为国家机密,藏于深宫,密不示人。最终,很大一部分手绘作品都未能存世。作为菲利普二世的御用制图师,豪尔赫也只有这一幅关于中国的地图,经过奥特柳斯之手,间接流传了下来。至于他的这张图是如何自王室飘落民间,从西班牙来到安特卫普,又被奥特柳斯所获,我们一无所知。

但可以肯定,奥特柳斯重制此图的目的,与豪尔赫截然不同。《寰宇大观》不是国家秘密,而是向公众兜售的商品。我们只需要看一眼这张中国图,就立刻能感受到尼德兰学派对图画艺术性的追求和工

---

① Michael Pearson, “Lake Chiamay: Asia's mythical mother of rivers,” *The Globe*, No. 83 (2018): 43-62.

② 见 J. B. Harley, *The New Nature of Maps: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成一农:《“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日本史家宫崎市定甚至声称:“古地图的价值就在于其本身的错误。”见氏著《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下)》,张学锋、马云超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299 页。

艺的高超:它以铜版刻蚀,在印刷的底图上,手工着色完成。山川、河流、城池和海岸线,都以动感的点线勾勒点缀。图上的帐篷、舟车、动物,造型精巧,与其说是说明性的,不如说是装饰性的,用以填充空白。在放置比例尺、标题和制作年份的角落,饰有精美的、由天使及动植物组成的涡卷图案(cartouche)。画幅中所有字体整洁雅致。地图四周还配以略显繁复的边框,使之看上去更像是一幅可挂在墙上欣赏的巴洛克风格画作。

如果我们从商业角度理解这幅地图,也许就能理解奥特柳斯对信息的选择了。在 1584 年,尽管前几版《寰宇大观》已大获成功,但他仍然要不断扩充其内容,以应对对手的竞争。《中国图》令他再次抢得先机。也正因为面向的是一般消费者(而非君主),在得到豪尔赫的原图后,奥特柳斯要将它美化并详加装饰。至于地理信息,除了保留“洪水男孩”这种颇具传奇性的情节外,奥特柳斯还必须考虑到当时人们对中国的一般性认知,不能太过偏离一些既定印象——即马可·波罗所带来的印象。所以一边以 China 命名中国,另一边在亚洲总图中,仍然保留了 Cataio 与 China 的并列。

每一幅地图,当然都有多种角度赏析、解读。我在这里突出的,是奥特柳斯《中国图》与欧洲方兴未艾的商业资本主义的联系。这种联系既体现在地图的市场化、书商的职业化、地图消费的市民化上,也体现在作为新兴资本势力的荷兰,强势介入、主导欧亚海洋贸易网络上。以奥特柳斯为代表的尼德兰制图学派的兴起,正因为它处在欧洲资本主义对内变革、对外扩张的时空交点。

二、竞争:“黄金时代”的制图师们

在发表了《中国图》11 年后,奥特柳斯又在更新版的《寰宇大观》中,增添了欧洲地图史上第一幅日本和朝鲜地图(图四)。虽然名为《日本岛描述》(Iaponia Insulae Descriptio),但图上朝鲜占据了可观的位置。只不过,当时的欧洲人仍不清楚朝鲜到底是岛屿还是半岛,更缺乏对其形状、大小的具体了解,所以把它画成一个状如悬针的岛(Corea Insulae),而其北端则有意模糊处理。日本的形状大体接近现代地图的模样,可以明确辨认出三大岛:本州、四国和九州(北海道要到明治晚期才正式纳入版图)。当然,图上的地理信息也是经过多重传递的,比如三个大岛的名字,分别是 Meaco(京都)、Tonsa(土佐)和 Bungo(丰后)。而且本州岛东西向延展,几乎和朝鲜构成垂直关系。有趣的是,朝鲜的南端和朝日间的对马岛,被分别注明是“盗贼角”(Punta dos Ladrones)和“盗贼岛”(Ilhas dos Ladrones),大概得名于当时盛行的倭寇吧。

《日本岛描述》的原作者也不是奥特柳斯,而是葡萄牙人路易斯·特谢拉(Luis Teixeira)。他的生卒年份难以确考,但我们知道他出身于制图世家,服务于西班牙王室,有 15 张地图作品流传于世。除了这幅日本图,他还制作了亚速尔群岛和巴西东海岸的早期地图。特谢拉和尼德兰诸多的制图师都有密切联系。奥特柳斯曾委托他绘制中国和日本地图,不过最后只有日本地图收录于 1595 年版《寰宇大观》。我们不知道特谢拉从何处得到的资料,只能猜测是去过日本的耶稣会士。① 和 1584 年《中国图》一样,这幅地图在以后的数十年中,成为日本和朝鲜在欧洲市场上的“标准像”。

在 16 世纪的安特卫普,乃至整个欧洲,没有任何一本地图集像《寰宇大观》那样畅销不衰。奥特柳斯及其后继者对数量和质量的不断追求,正是其成功的秘诀。从 1570 年首版,到 1612 年停止更新,这本地图集从最早的 53 张图版,扩充到 167 张。除了拉丁文外,它还以荷兰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德文和英文出版,总共发行了约 32 个版本,直到 1640 年还在印制。奥特柳斯于 1598 年离世,其后人在 1601 年把他的地图刻板卖给了出版商乔安·弗伦特(Joan Baptist Vrients),弗伦特一直到 1612 年去世前,仍不断增添内容再版。

① Henny Savenije, “Korea through western cartographic eyes,” 2009. http://www.cartography.henny-savenije.pe.kr/index.htm (accessed June 3, 2021).

也就是说,《寰宇大观》平均每一年多就会推出新的版本,以此牢牢掌握它在地图集市场上的头把交椅。当时它主要的竞争对手有两个,一是杰拉德 · 裘德(Gerard de Jode)的《世界之镜》(Speculum Orbis Terrarum),二是杰拉杜斯 · 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的《地图集》(Atlas)。《世界之镜》初版于 1578 年,但销量远不如《寰宇大观》。裘德致力于扩充其内容,可惜天不假年,他于 1591 年亡故。他的儿子接过其未竟之事,两年后出版了新版,不但地图数量增加,有的质量甚至优于《寰宇大观》,怎奈《世界之镜》仍然不是后者的对手。墨卡托的《地图集》是第一本以当代人熟悉的词汇"Atlas"(即地图集)命名的书籍,它是在这位杰出的地图学家过世一年后,于 1595 年首次出版的。但当时的《地图集》并未最终完成,墨卡托的儿子也没能持续更新图版,所以在 1604 年前,《地图集》在市场上不敌《寰宇大观》。就东亚图像而言,这两个竞争对手都没有推出单独的中国或者日本地图。

活跃在尼德兰地区的制图家和出版商当然不止这几位,他们之间也既竞争又有合作,特别是墨卡托与奥特柳斯。墨卡托不但创制了迄今最为流行的地图投影法,更可以说是欧洲商业地图出版业的开创者,他的活动遍及低地国家,直接推动了 16 世纪以安特卫普为中心的商业制图行业。正是在墨卡托活跃的时代,地图制造"从一个少数学者和印刷工人从事的次要事务,转变为一大群企业家参与的主要经济活动"。①

安特卫普的崛起,和文艺复兴后期南欧和西北欧出现的两个趋势相关。第一是意大利城邦国家逐渐衰落,欧洲的经济中心向北迁徙。安特卫普毗邻海港,商贾云集,自然也成为财富、文化和信息交汇之所。第二是印刷术在的兴起,带动了印刷制品——包括书籍和地图——的普及②。书籍成为利润颇高的商品,法兰克福书展也提供了各类书籍流通的重要平台。当时,诸多出身德意志地区的知识分子,投身于天文学、地理学和制图学的研究。比如第一次在地图上命名"美洲"的马丁 · 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uller)、对奥特柳斯产生巨大影响的塞巴斯蒂安 · 缪斯特(Sebastian Munster),以及杰拉杜斯 · 墨卡托。大航海和宗教改革,大大刺激了欧洲人对世界的好奇心。在尼德兰地区,资本、技术和知识找到了最佳的结合方式。这里不但聚集了大量出版商,而且有最好的雕版师,也有一代出色的学者。于是,现代制图术在此"变成了一项产业"。③

但是安特卫普的国际商都地位,过多依赖于对外部资源④。随着尼德兰与西班牙之间矛盾日深,八十年战争爆发,安特卫普于 1585 年被西班牙攻陷,地位迅速衰落。尼德兰制图学派的中心,旋即转向了另一个国际商业都市阿姆斯特丹。1602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VOC)成立,阿姆斯特丹随之成为欧洲航运、贸易、金融和文化中心,其地位一直保持到英国崛起的 18 世纪。

尼德兰学派"黄金时代"在阿姆斯特丹延续的标志,是 1604 年的一笔买卖。本地制图师约道库斯 · 洪第乌斯(Jodocus Hondius, 1563—1611)与大出版商柯内利斯 · 克莱兹(Cornelis Claesz)携手,在莱顿的拍卖会上,以巨资拍下了墨卡托家族的制图铜版。此后,墨卡托的事业在洪第乌斯手中获得新生。洪第乌斯为《地图集》增添了许多新图,其中不少是他亲自绘制。1606 年,"墨卡托—洪第乌斯《地图集》"出版,含 143 幅地图,因制作精良,很快销售一空。此后他又出版了口袋本的《小地图集》(Atlas Minor),同样大获成功。

新《地图集》增加了关于亚洲的篇幅,很多就来自于《寰宇大观》——比如亚洲总图、鞑靼地图、日本

① Cornelis Koeman, Günter Schilder, Marco van Egmond, and Peter van der Krogt, "Commercial Cartography and Map Production in the Low Countries, 1500 - ca. 1672," in David Woodward ed.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ume Three, p.1299.

② Biggs, Michael, "Putting the State on the Map: Cartography, Territory, and European State Formatio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41, n2, (1999), pp. 374-405.

③ Jerry Brotton,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2 *Map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2, p.264.

④ 王蓓:《16 世纪安特卫普衰落的内在经济因素探析》,《世界历史》1999 年第 1 期,第 57—63 页。

图、东印度图等等,可说是基本照搬。但其中的《中国图》(China,图五),却有了很大差别。

图四:奥特柳斯《日本岛描述》,1595 年版《寰宇大观》。
来源:网络资料。

图五:《中国图》,载墨卡托—洪第乌斯《地图集》。
来源:网络资料。

此图的基本格局仍然来自奥特柳斯,但旋转成了以北为上。辽东和山东半岛,已经依稀可辨了。同时,它把奥特柳斯的“中国图”和“日本图”结合在了一起(尽管书中另有一幅单独的“日本图”),“竖式”中国只占据画面中间靠左的三分之一,右侧则完全给了太平洋;在画面右上方,还出现了北美洲。这样安排,似乎是为了展现了美、亚两大陆与太平洋的地理关系。和流行了多年的奥特柳斯中国图相比,洪第乌斯去掉了长城外罗列的地名,保留了“洪水男孩”的情节,又添加了关于风帆车和朝鲜的说明。特别值得注意是:在日本右侧,洪第乌斯安排了一幅涡卷图案,上面画着一名日本人以长矛刺向绑在十字架上的天主教徒,下方的拉丁文图例,也描述了日本对待教徒的种种“残忍”行径。可见,丰臣秀吉与德川家康禁教的消息,引发欧洲人的关注。

天主教在“新大陆”和殖民地积极扩张之日,正是它在欧洲备受挑战之时。新教改革席卷西北欧洲,在张扬人文主义精神的同时,也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勃兴。一批新教国家,借着不断积累的财富,开始挑战天主教帝国的权威。尼德兰首当其冲,掀起反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和天主教压迫的斗争。这被恩格斯视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幕”。① 洪第乌斯早年就因躲避战争和宗教迫害,逃到英国,与那里的制图学家过从甚密。而日本禁绝天主教、驱逐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为唯一可以合法从事对日贸易的欧洲机构,荷兰也因垄断东亚海上商路,长期称雄欧洲,获益无穷。如此看来,洪第乌斯特别强调天主教在日本的厄运,可能不只是批评日本,更是警告对手——热衷向亚洲传播天主教的西班牙——要小心为妙。

1612 年,掌握着奥特柳斯图版的弗伦特逝世了,从此《寰宇大观》再未更新。同年,洪第乌斯也去世了。但幸运的是,他的遗孀、两个儿子和女婿发扬了他的事业,让家族生意蒸蒸日上,尤其是他的女婿杨·杨松纽斯(Jan Janssonius),不断扩张着墨卡托—洪第乌斯开创的地图王国。17 世纪初,洪第乌斯《地图集》终于超越《寰宇大观》,之后垄断市场二三十年,总共再版五十余次,一时风头无两。

抛开其艺术性和商业性,就学术贡献而言,墨卡托—洪第乌斯地图对中国或东亚的描述,其实没有太多突破。亚洲总图中,契丹仍然和中国并列;中国地图中,出现了好几个北京:Quincii(京师),Paquin(北京)和 Xuntien(顺天);其中顺天还与杭州(Quinsay,行在)相混淆;朝鲜仍然被绘制成一个悬针型岛屿,其北方与大陆若即若离。而在《小地图集》中,也许是出于纸张版式的考虑,中国地图则保留了上西

① 刘远图:《马克思恩格斯论尼德兰革命的世界历史地位》,《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 年第 2 期,第 9—11 页。

下东的竖琴形状，看上去与奥特柳斯几无差别。在 17 世纪早期，其他国家的制图师，也不过是在洪第乌斯的基础上出版自己的中国地图，仅在装饰上稍作改动。总之，因为地位稳固，洪第乌斯地图集在首版后的 25 年中几乎没有更新。

新的竞争者至 17 世纪 30 年代才出现。这就是阿姆斯特丹另外一家显赫的出版世家，布劳（Blaeu）家族。第一代的威廉·布劳（Willem Janszoon Blaeu，1571—1638）曾就学于丹麦天文学家第谷（Tycho Brahe），精通数学、地理和天文。在 1600 年前后，他在阿姆斯特丹开业，靠着出版单幅地图、制造地球仪，以及制作航海指南和导航仪，积累起声名和财富。布劳家族与洪第乌斯—杨松纽斯家族在这些产品上互有补充，也有所竞争。但在地图书籍领域，墨卡托—洪第乌斯《地图集》的地位，仍难以撼动。①

机会不期而至。1620 年左右，洪第乌斯的两个儿子分道扬镳，家族事业出现裂痕。布劳不知通过什么手段，获得了其中一个儿子手中的未刊地图，然后他以自己的名义，在 1630 年出版了直接针对《地图集》的《地图集补遗》（Atlantis Appendix）。此时市场上很期待一部与《地图集》不同的新作品，布劳的“补遗”遂大受欢迎。自此，布劳与洪第乌斯—杨松纽斯两家的地图集竞争正式展开。② 而在 1633 年，好运再次降临：布劳被任命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制图师。这意味着，他不但可以靠着公司订制的地图和导航工具获得稳定、丰厚的收入，而且还能够获得最权威的地理信息。1635 年，布劳以《新地图集》（Novus Atlas）为旗舰产品，不断扩充内容，开本越来越大，书也越做越厚。3 年后，威廉病逝，他的儿子约安·布劳（Joan Blaeu，1596—1673）一手接管家族企业，一手接过父亲在东印度公司的职位，继续与老对手杨松纽斯竞争。两种地图集互相比拼数量，收录的地图越来越多，到了 17 世纪 50 年代，《地图集》和《新地图集》中的图版多达 400 多幅，加之大量的文字，只能分成多卷本发行。

约安·布劳更具野心。1662 年开始，他着手出版一套史上最为庞大的地图书籍，意图一劳永逸地实现对市场的垄断，这就是尼德兰制图学派的巅峰：《大地图集》（Atlas Maior），其副标题为“布劳的宇宙学，精确描绘陆地、海洋与天空”。在此后的十年内，《大地图集》以拉丁、法、荷、德、西等文字出版，各版分别有 9 至 12 卷不等，装下一整套，需要一个专门的书柜。全书收录近六百幅地图，全部铜版印制，装帧精美华贵，根据顾客财力，有黑白本和手工着色本。这成为 17 世纪欧洲价格最为昂贵的一套书。

不少地图史家评论，《大地图集》是巨大的商业成功，却并没有在学术上有什么进步。理由是绝大多数地图都是已发表过的，只以数量撑起规模而已。③这么说似乎过于否定布劳家族地图学贡献。首先，《大地图集》的出版，商业目的肯定是最主要的，但布劳还有更大的抱负：他力图以哥白尼日心说理论，对人类的宇宙观做出全新的图像解释，只不过他生前只完成了陆地部分，海洋和天空部分未能展开。其次，收录于《大地图集》的，包括此前曾单独出版过的图集，而这其中有的对欧洲地图学有巨大推进。最明显的例子，是曾于 1655 年发行、后编入《大地图集》（拉丁文本）第十卷的《中国新地图集》（Novus Atlas sinensis，图六）。

《中国新地图集》是耶稣会士卫匡国（1614—1661）依据大量明代史籍、图书、方志，外加他本人实测经纬度编纂而成。④ 它收录一幅全图、15 幅分省图，以及一幅日本/朝鲜图，不但是欧洲第一部中国分省图集，而且修正了前文提到的大量的模糊认知，彻底摆脱了奥特柳斯风格。至此，欧洲地图学家终于走出了马可·波罗的阴影，欧洲地图中的东亚，也更接近中国本土地图——比如罗洪先《广舆图》——中的形状了。《中国新地图集》此后被大量引用，成为 17 世纪中叶到 18 世纪中叶，欧洲最具现实主义

① Koeman, etc, “Commercial Cartography and Map Production,” p.1314.

② Brotton,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2 Maps*, pp. 275-276.

③ Koeman, ect., “Commercial Cartography and Map Production,” p.1330; Brotton,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2 Maps*, pp. 286-288.

④ 马西尼：《关于〈卫匡国全集〉第三卷〈中国新地图集〉的几点说明》，《国际汉学》2005 年第 1 期，第 63—72 页。

精神的东亚画像。①

耶稣会士和出版商的合作可谓机缘巧合。刚刚经历了明清鼎革的卫匡国,受耶稣会派遣回欧洲,向反对耶稣会传教策略的罗马教廷解释“中国礼仪之争”。他积极和布劳合作出版他的中国论述,大概也是希望公众能尽早读到这些作品,了解中国,以利其论争。② 而对布劳而言,卫匡国带来的独家资料,不但能更新对亚洲世界的认知,更可打破长期由洪第乌斯-杨松纽斯垄断的中国图像,同样有利于他的市场竞争。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了两者合作的中介:公司让卫匡国免费搭船从巴达威亚(今雅加达)回欧洲③,而布劳在得到卫匡国的地图手稿后,也根据东印度公司掌握的资料,对海岸线进一步加工编辑。④

就在布劳的地图事业迈向顶峰时,他的印刷厂在 1672 年毁于一场大火,许多铜版都被烧化。约安·布劳也在第二年亡故。他的对手杨松纽斯早在 1664 年也去世了。两大家族从此没落。而其他制图师再也没有能与这两套书竞争的雄心和财力。尼德兰制图学派最辉煌的年代,走向终结。

三、俗欲:地图的利润及消费

科学主义的进步史观,会把地图学的演进,看作是理性精神的必然胜利。如果充分考虑到 16、17 世纪欧洲地图学发展的资本主义背景,我们或许会少一些浪漫化理解。大航海时代到来,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兴起,重塑了人与空间的关系,原本依靠神话、宗教和皇权建立的世界图景,逐渐淡出。在利益的驱使下,地图的实用性和工具性凸显。制图学家也发现,人们对空间的图像需求日益增大,“空间”是可以被消费的,而制造“空间”更可以带来不菲的利润。欧洲的地图学革命,其源动力,正是地图作为商品,在世俗欲望的推动下,被大规模生产和消费。

在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官员、商人、学者和普通市民,可以根据需要,找到适合自己消费水准的地图产品。小张单图、大张挂图、各种型号的地球仪,或者地图集,可谓应有尽有。如果觉得大型地图集太贵,则可以买口袋本。⑤ 地图的价格不一,取决于尺寸和制作工艺(比如是否上色)。单张简易的欧洲地图可能只需要 3 斯图弗(20 斯图弗等于 1 荷兰盾);四联张的城市俯瞰图大概 10 斯图弗;6 联张的标有建筑物的大幅城市地图则要 40 至 60 斯图弗,相当于 2 到 3 荷兰盾。15 联张的大地图一般要 3 到 5 荷兰盾。⑥ 墙上挂图就更贵一些,可能要花十几个荷兰盾,与一幅油画的价格相当。《寰宇大观》1570 年上市时,据纸张、装帧和着色的不同,价格在 6 至 16 荷兰盾之间。1655 年布劳出版的《新地图集》,每卷价格已经涨到 25 到 36 荷兰盾。⑦

可资对照的是当时人的工资水平。在 1570 年左右,一个印刷工人的年工资在 100—150 荷兰盾之间。⑧ 即《寰宇大观》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在 1660 年左右,画工给地图上色,报酬不过是每一幅 3 斯图弗;一个书店助理每周的工资是 2 荷兰盾(年薪是 100 盾多一点);而在阿姆斯特丹的商业中心租一家书店店面,每年是 400 到 700 盾。布劳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制图师,地位可谓令人羡慕,其年薪

① Mario Cams, “Displacing China: The Martini-Blaeu *Novus Atlas Sinensis* and the Late Renaissance Shift in Representations of East Asia,” *Renaissance Quarterly*, Vol 73. 3 (2000), pp. 953-990.

② 曼斯缪·奎尼、米歇尔·卡斯特威诺:《天朝大国的景象:西方地图中的中国》,第 200—201 页。

③ Kees Zandvliet, “Mapping the Dutch World Oversea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ume Three, p.1442.

④ Cams, “Displacing China: The Martini-Blaeu *Novus Atlas Sinensis* and the Late Renaissance Shift in Representations of East Asia,” pp.982-983.

⑤ Koeman, ect., “Commercial Cartography and Map Production,” p.1306.

⑥ Sutton, *Capitalism and Cartography*, p.26.

⑦ Brotton,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2 Maps*, p.284.

⑧ Koeman, ect., “Commercial Cartography and Map Production,” pp. 1330-1331.

是 500 荷兰盾,大概是阿姆斯特丹一座房子的成本。①

于是我们大概可知《大地图集》的价格有多夸张了:一套黑白版就要 350 荷兰盾,而彩色版更高达 450 荷兰盾——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两万英镑(或 18 万人民币)②。布劳一共印制了 1550 套《大地图集》,除去成本,利润相当可观。自然,能买得起的,要么是富商巨贾,要么是位高权重的政客。

虽然一套彩版《大地图集》的价格,几乎赶上布劳在东印度公司的年薪,但他的实际收入不能以工资计算。公司规定,每艘船上都要配备航海图,而航海图须定期更换。每一幅海图,公司都支付给布劳 5 至 9 荷兰盾,每船一整套海图要花费 228 荷兰盾。有学者估计,其净利润可达 164 盾,利润率超过 70%。1668 年,布劳向公司提交了 21135 荷兰盾的天价账单,照此估计,这年他从公司得到的净利润就达 1.6 万。③ 而这还不包括一些私人订制的产品。1644 年,他向望加锡国王献上一只手绘地球仪,得到了 5000 荷兰盾的报酬。他得到的各种订单,数目少则几百,多则几万。④布劳印制《大地图集》的 6 年里,他的印刷厂雇佣了将近八十人。印厂失火,其损失高达 38.2 万荷兰盾。从这里也能看出来,为什么很少有其他制图家,能够与布劳或者洪第乌斯家族一争高下。因为即便有人获得了更新的地理知识和资料,高昂的制作成本与运营费用,也难以让这些知识转化为商品。

到了 17 世纪中,阿姆斯特丹制图商之间的竞争,已经纯然是资本的竞争。无论是布劳家族,还是洪第乌斯—杨松纽斯家族,都明白获得更多顾客和更大市场的关键,主要是地图的数量而不纯是质量,是艺术的炫耀性而不是科学的严谨性。举例来说,奥特柳斯风格的《中国图》和《日本/朝鲜图》,主导欧洲对东亚的空间想象半个多世纪,这并不是由于在此期间欧洲人没有获得更精确的地理资料。17 世纪初,已经有不少中国本国的地图,由商人或者传教士带回欧洲。⑤ 但它们大部分并没有被商品化。这和当时生产端的垄断,以及特定知识的消费惯性,恐怕是有关系的。

那么在消费端,又是什么情况呢?地图类产品从贵族王公专属,变成中产市民阶层可以拥有的财产。在尼德兰地区,不但商人、政治家喜欢地图,知识分子、医生、理发师、酿酒师,甚至寡妇,都是地图的买家⑥,他们尤其热衷用挂图来装饰墙壁。“对荷兰公民来说,地图代表了技术和地理学的进步。此外,阿姆斯特丹制图商和书商享受的垄断利益,促进了一种国民意识的发展。”⑦

在加尔文宗主导的荷兰,新兴资产阶级追求财富和身份,既正当又是必须。当经济成功和宗教拯救联系在一起,财富也就成了新的宗教。一张大幅的墙上挂图,或者是书房中精美的地图集,既提供认知地理的方式,更是资产、身份和品位的象征。艺术史学者伊丽莎白·萨顿评论:

> 印刷的地图不仅提供了国家治理的机制,而且强化了买家的身份认同。财产内在于个人展现的身份,显示拥有财产则可以获得地位和承认。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身份本身就是资本的形式,是在机械、去人性、同质的体系中彰显自我的一种方式。吊诡的是,每个人都必须拥有、掌控什么东西,来确认或宣称他的主体性,个性,以及人性,以此延续着一种等级体系。⑧

最直观的视觉史料,就是 17 世纪风俗画家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 1632—1675)的画作。维米尔居住在代尔夫特,这座城市正好位于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之间,也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部之一。他

---

① Brotton,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2 Maps*, p.282.
② Brotton,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2 Maps*, p.282.
③ Zandvliet, “Mapping the Dutch World Oversea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pp.1439-1440.
④ Brotton,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2 Maps*, p.282.
⑤ 卜正民:《全图: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地图学互动》,第 188—204 页。
⑥ Sutton, *Capitalism and cartography*, p.25.
⑦ Koeman, ect., “Commercial Cartography and Map Production,”p. 1347.
⑧ Sutton, *Capitalism and cartography*, p.46.

传世不多的油画中,有相当一部分表现了市民家中挂着的地图或者摆放的地球仪,它们正是洪第乌斯或者布劳的产品。历史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指出,当时荷兰的这类凸显市民日常生活的画作中,订制者无不以拥有的商品,来炫耀、昭示身份:包括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来自美洲的海狸皮、白银,以及来自非洲的黑奴等等。① 地图和地球仪,正成为这些全球流动的商品在此汇聚的线索和隐喻。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产阶级市民群体对地理空间的消费行为(观赏地图),与全球化时代的商品消费行为,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背后支撑这种联系的,是崛起的商业帝国,以及这个帝国在全球的殖民扩张。这是理解尼德兰学派兴盛的关键。

四、权力:从公司到帝国

1592 至 1594 年间,阿姆斯特丹的知名出版商柯内利斯·克莱兹(也就是和洪第乌斯一起买下墨卡托底版的那位),出版了一系列海图。这是荷兰联合省最早的一批反映非欧洲世界海岸线的地图。其中有一幅《摩鹿加群岛》(Insulae Moluccae,图七),表现的是从中国南部沿海、中南半岛,一直到所罗门群岛的东南亚海域,完整描绘了今天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的主要岛屿。

此图最特别的地方,是在下方绘制了肉豆蔻、丁香和檀香等当地特产,并附上简要说明。因此这张地图有个昵称叫"香料地图"。它的作者,是阿姆斯特丹首屈一指的天文学、神学和地理学者彼得勒斯·普朗修斯(Petrus Plancius,1552-1622)。

普朗修斯也是尼德兰制图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早年是加尔文教会的教士,因躲避与西班牙的战争和宗教裁判所的迫害,从布鲁塞尔逃到了阿姆斯特丹,之后开始钻研地理学和地图学。1592 年,他制作了一幅广受欢迎的世界地图,从此声名鹊起,此后受邀为荷兰的海外贸易公司制作海图。《摩鹿加群岛》主要依靠葡萄牙人的资料制成,有很多地名翻译自葡语。② 这是因为当时葡萄牙垄断东南亚香料贸易,而荷兰联合省的航海事业还刚起步,必须借鉴葡萄牙人的材料。不过很快,荷兰人就于 1595 年,派出了第一支驶向东南亚的船队,他们避开葡萄牙控制的马六甲,从巽他海峡进入太平洋。在随后的几年中,荷兰人陆续占领了爪哇和巴达威亚,开始了与葡萄牙的竞争。普朗修斯制作的海图,为这一系列航海行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几年的探索之后,1602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成立。普朗修斯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也很自然地成为公司的第一位制图师。③

图六:《中华帝国新描述》,布劳《中国新地图集》,1655 年。来源:网络资料

图七:普兰修斯《摩鹿加群岛》,1594 年左右。网络资料。

① 卜正民:《维米尔的帽子:17 世纪和全球化的黎明》,黄中宪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

② Günter Schilder and Marco van Egmond, "Maritime Cartography in the Low Countries during the Renaissance,"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ume Three, p.1408.

③ Koeman, ect., "Commercial Cartography and Map Production,"p. 1311.

普朗修斯身上集中体现了时代的大主题:新教与天主教的对立,荷兰联合省与西班牙帝国的政治矛盾等。但他的这幅东南亚地图,却充满了经济冲动,表达对资源的占取欲望。在欧洲人眼中,正是香料,把散乱的东南亚群岛凝聚成一个可以被整体认知的地理单元。如果说当时的中国,还只是一个充满传说、传奇的地方,那么东南亚则完全是功能性、物质性的。这片海域所蕴藏的财富,几乎唾手可及——只要我们能够找到最佳的航行方法。

资本主义不仅仅意味着贸易和商业,它要求地理空间的认知,要配合新的生产方式,包括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力、运输和市场的有效组合配置。新的制图术,自然而然也反映着这种看待世界的意图。但地图上密密麻麻的航向线,把巨大的西太平洋海域牢牢锁在人类可航行、可认知、可占领的意识里。资源和航道,取代了浪漫化或鬼神化的虚空,地球上的"空间"(space),就按照这种经济理性,被重新分隔或合并,产生出全新的意义,变成了"地方"(place)。普兰修斯地图带给读者的,不是对异国或异域文化的想象,而是对财富的憧憬。

当然,把地理与财富联结认知,不是从尼德兰学派才开始的。人类对物质的渴求从来就是地理探索的动力之一。但是,如果没有和印刷资本主义与新兴资产阶级的强大逐利需求相结合,地图所能产生的现实作用,是大打折扣的。普兰修斯则不一样,他从对手那里秘密获取情报,然后加工成自己的地图,再交付出版商批量发行,推动荷兰的商业公司去建立海上霸业。

普兰修斯开创的地理学家、出版商与国家公司的合作,在 17 世纪 30 年代被布劳家族继承。和前者一样,布劳父子持续为东印度公司提供航海服务。在《大地图集》中,表现东南亚海域的两幅地图(《东印度群岛》和《摩鹿加群岛》),都延续了普兰修斯的海图风格,画面布满了航向线,和其他东亚图像很不相同。

当然,光是画地图,还不能建立起新的空间解释。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的第二年,它就和葡萄牙发生了冲突。一艘满载中国商品的葡萄牙商船"圣卡塔里那"号,在新加坡海峡附近,被东印度公司的船劫持,货物也拉到阿姆斯特丹拍卖。葡萄牙提起诉讼,公司则请来一位二十出头的法律天才,为自己辩护。年轻人叫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他提出:海洋是开放的,任何人都有航行贸易权;而因为荷兰正在和领有葡萄牙的西班牙打仗,因此这次劫掠属于战争行为,圣卡塔里娜号上的财货属于"战利品"。此次辩护开启了现代国际法对海洋的定义。1609 年,格劳秀斯出版了《自由的海》(Mare Liberum),树立了以自然法规范海洋空间的国际法传统。在这之后,他继续完善自然法哲学,于 1625 年出版了更为系统的《战争与和平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这本巨著被公认为是现代国际法的理论基底。现代国际法所关注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如何以欧洲人的私有产权概念为参照,判定陆地和海洋空间的主权性质。①

而《战争与和平法》在阿姆斯特丹的出版商,正是威廉·布劳。布劳家族与格劳秀斯有不少合作,这基于两者的共同点:都是与正统加尔文派不同的抗辩派(Remonstrant);也都相信伽利略阐释的日心说②,共享一套宇宙观;他们都是社会名流,具备政治影响力,可相互带来利益,也都是东印度公司倚重的知识资源。制图商和法学家,一个重塑空间的视觉解释,一个重塑空间的法理解释,以不同的方式,建构着现代资产阶级帝国,也彻底重新定义了地球空间。1648 年,荷西之间的八十年战争,随着全欧洲三十年战争的结束而结束,参战各国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成为现代国际体系的滥觞。直到这一年,荷兰作为一个"共和国"才正式成立。但是,这个新国家的基础:宗教理念、价值体系、地理观、商业实践、殖民行为和战争原则,早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的 17 世纪初,就已经奠定了。

---

① Carl Schmitt, *The Nomos of the Earth*,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Jus Publicum Europaeum*, Trans. G. L. Ulmen, Telos Press, 2006.

② Brotton,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2 Maps*, p.279.

余　论

地理信息的增加,会促进实用性的地图向更加准确、科学的方向发展,但所有信息都是经过人们过滤、加工,从不是纯然客观的。地图反映的正是制作者对地理信息的主观处置。欧洲地图学走向“现代”,当然是哥伦布开启所谓“地理大发现”的结果。从源动力上说,此种“现代”受资本驱使、服务于开拓商路的需求;其最突出的表现形式,是欧洲强国对“未知领地”的殖民和掠夺;最后形成了欧洲与世界最根本的权力关系,即帝国主义的等级秩序。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构成欧洲“现代”情境的三位一体。本文重点讨论了资本主义这一环节,但是行文到最后,我们已不难看出,在尼德兰学派开启的地图资本主义的背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如影随形。①

Customization: The Portrait of East Asia in the Era of Capital ——China and Asia in the Netherlands School of Cartography During the16th and 17th Centuries

Song Nianshen

(*Tsinghua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6th century to the 17th century, there came the golden age of modern cartography in Europe, along with the Age of Discovery and the expansion of global trad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cartographic works in that period were those made by the Netherlands School of Cartography (尼德兰制图学派) whose activities were centered in Antwerp and Amsterdam. During that period, the cartographers in Europe not only published the first map entitled *China*, but also constantly expanded their cartographic display of Asia, particularly of East Asia. The development of cartography and the popularity of atlases, however, were not merely due to the accumulation of geographic knowledge. In the era when global capitalist network was taking shape, maps were both instruments and commodities. The rise of the Netherlands School of Cartography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sperity of the printing business in the Low Countries, to the flourishment of the book market, to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cartographers, and to the trade exploration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荷兰东印度公司) in Asia. On these bases also unfolded a new imagination of the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uropean society and the Asian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function of maps and capitalism, this article thus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cartography and the geographical recognition of East Asia by Europe.

Key words: cartography; East Asia; Netherlands School of Cartography (尼德兰制图学派); *Theatrum Orbis Terrarum*v (《寰宇大观》); atlas

(责任编辑　管　琴)

① 关于地理空间、制图术与殖民帝国主义关系的讨论,参见拙文:《地图帝国主义:空间、殖民与地球规治》,《社会学评论》2022 年第 1 期,第 5—26 页。